

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和人才培养¹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胡春春

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与建设新型高校智库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新的形势下一项重大创新举措，这必然引发高校从学科定位到行政管理等诸方面的不断调整，从而在现有规则和制度创新之间摸索最佳的结合或平衡。本文将从国别与区域研究现状总结和国外经验分析两方面入手，判断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并由此为出发点，讨论其学科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才培养制度建设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 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科学研究方向的发展现状

国别与区域研究（Country and Area Studies）——或者在广义上使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兴起与发展始终处于外部条件和学科化的张力之中。²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起源地美国为例，区域研究从最初就与在冷战中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外部条件密不可分，³而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度遇冷也与冷战结束以及随之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的盲目乐观认知不无关系。⁴同时，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秩序上的“去区域化”和“去民族国家化”，从而使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历史性概念，学理上难免有左右失据之嫌。⁵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美国高校的国际性，区域研究随之获得了惊人发展，区域研究课程已经成为美国当代高等教育——无论是基础学习还是高等研究阶段——理所应当的标准设置之一。⁶不过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上述种

¹ 本文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工作论文，尚未终稿。

² 参考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I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0, No. 2(1997), pp. 166-169; Peter J. Katzenstein, 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4, No. 4(2001), pp. 789-791; David L. Szanton,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edited by David L. Szanton,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ermalink: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59n2d2n1>.

³ Bates 1997: 167; Katzenstein 2001:789. 另参考 Kurt Hübner, Area Study Centres in North America. Keynote of “India-EU Study Centres Programme. Workshop on Area Study Centres”, 2011. <http://ies.ubc.ca/area-study-centres-north-america>, 访问日期：2014 年 11 月 2 日。

⁴ Katzenstein 2001:790.

⁵ Szanton 2002; Hübner 2011.

⁶ Szanton 2002, esp. “The Astonishing Growth of Area Studies”.

种外部条件仅仅是左右国别与区域研究发展的部分动因，真正的挑战，恐怕还是来自科学研究内部，即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压力以及科学研究范式演化提出的问题。

哈佛大学的 Robert H. Bates 以政治学为例，把区域研究面对的内部挑战总结为以具体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 bound）为旨趣的传统区域研究导向和以普遍化和理论化为旨趣的社会科学导向之间的差异。⁷

按照 Bates 的分析，“政治学领域内的区域研究专家无论从倾向还是从学术训练上都是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他们在了解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政治之外，还寻求掌握该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文学和语言。”⁸如此一来，他们实际是在沿用人种志的学术标准，即严肃的学术必须基于“田野研究”（field research）。与此相对，那些把区域研究定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并不追求对于某一特定区域的深入理解”，而是“致力于发展出普遍的理论，以及辨析、测试由之派生出的假说”。⁹他们原则上可以使用任意区域和国别的材料，从而在方法论上拒绝了政治规律性受区域限制的预设。

无论 Bates 在何等程度上刻意夸大了类型化的差异，传统的区域研究导向和社会科学导向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此消彼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¹⁰康奈尔大学的 Peter J. Katzenstein 更具体地描述了这种学术范式的演化。¹¹在政治学内部，从事区域研究的比较政治学也不得不逐渐服从于演化的社会科学学科标准。这种学术范式的演化甚至引发了区域研究学术共同体内接受不同学术训练的学者的代际紧张。¹²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无疑可以从科学社会学、知识谱系学——乃至“知识政治学”¹³——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而且不是孤例。依照 Foucault 和 Wallerstein 的叙述，学科性的知识都是人类认知在某一社会发展条件下的“话语性建构”（diskursive Formation），¹⁴我们目前所沿用的社会科学学科分类源于现代世界秩序——包括或者首先是知识秩序——逐渐成形的 19 世纪中期到二战

⁷ Bates 1997:166.

⁸ Ibid.

⁹ Ibid.

¹⁰ Ibid. 另见 Hübner 2011, esp. “Methodological Issues”.

¹¹ Katzenstein 2001:789.

¹² Bates 1997:167.

¹³ Szanton 2002.

¹⁴ Michel Foucault, *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Mit einem Essay von Ralf Konersmann, 10. Aufl.,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7, pp. 22-44.

结束，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开放”和重组的时候。¹⁵这就使得跨学科的实践成为必须，这也是 Wallerstein 等人在报告中发出的“试验性倡议”（tentative proposals）。¹⁶在这一背景之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实践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实践恰恰多以报告中指出的“新兴的类学科和/或课程项目”（new quasi-disciplines and/or “programs”）形式出现的。¹⁷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一丝不同于此前纯粹建制性的后现代文化游击式、去中心式的逻辑。

然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化的最高形式必然体现在高校组织形式上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仍旧以区域研究的中心美国为例，美国的高校在区域研究建制化方面采取了两种途径：一是建立独立的区域研究系，二是建立平台性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或者提供区域研究课程项目。¹⁸不谋而合，我国高校在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也在探索类似的途径。这两种高校内部不同的组织形式既决定了学科取向，又与不同阶段的人才培养息息相关。

二.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

加州大学（伯克利）的 David L. Szanton 观察到，美国高校独立的区域研究系基本属于多学科导向，但是偏向文科。在本科学习阶段，课程设置包含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有时也包括某一地区的政治；在研究生阶段，课程设置开始集中于文学和历史领域。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之一就是培养的人才经常具有“双重认同”，比如说“既是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学研究者，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拉美学研究者”等等。从学科化的角度来说，这实际意味着传统学科——如上例中的历史学、社会学——依旧强势，而作为（建构中的）区域研究学科则被边缘化。其结果是，独立的区域研究系在高校中多处于“萎缩、边缘化和被动状态”。¹⁹

与高校内独立的区域研究系相比，第二种组织形式则更为灵活，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目前，美国高校设有大量的区域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这些机构一般没有设置独立的学位学习项目（degree course），但是能够吸

¹⁵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⁶ Ibid., p. 95.

¹⁷ Ibid., p. 71.

¹⁸ Szanton 2002, esp. “The Astonishing Growth of Area Studies”. 与 Szanton 对于美国高校区域研究发展现状的总结相比，Hübner 对于加拿大高校的区域研究现状持悲观看法，见 Hübner 2011。

¹⁹ Szanton 2002, esp. “The Astonishing Growth of Area Studies”.

引多个学科的学者和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课程、讲座、研习班、研讨会、科研项目、出版计划等学术活动，以及辐射社会。²⁰这对于美国的校园生态以及办学筹资等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美国的经验当然具有特定的美国色彩，但是某些普遍性问题无疑可以为我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建设提供借鉴。对比之下，中美经验的重大区别就是知识的学科化道路形态不同。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学科发展过程中，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²¹（下文简称《学科目录》）——以及此前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具有压倒性的约束力和引导性，成为高校评估、专业评估等貌似客观的相对固化标准。在这一背景下，没有进入上述《学科目录》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建制性发展的可能性严重受限。目前，为数很少的高校在现有一级学科之下自设目录外“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二级学科，实际更凸显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尴尬位置。鉴于国别与区域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语言掌握程度要求较高，²²目前国内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多集中于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系，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容又大大不同于传统语言文学研究的范畴，²³因而这一机制培养的人才很可能不具有美国式区域研究的“双重认同”，而是“无家可归”、“无所认同”。“我是谁？”可能是困扰目前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年轻学人的共同问题。基于这一认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遥不可期。

三.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德国经验

在学科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上，也许德国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国——德国——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所谓的学科和专业分类方面，德国施行的是联邦制的教育制度，同时高校拥有高度自主权，因而学科和专业分类不呈现为教育主管部门主导、高校

²⁰ Ibid.

²¹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

²² 对象国或区域的语言教学问题倒是美国区域研究学科化的争论焦点之一。

²³ Szanton 把区域研究理解成多个学术领域和学术活动的共称，其交集是：1.集中的语言学习；2.深入的当地语言野外调查；3.密切关注当地历史、观点、材料和阐释；4.经由细致观察，测试、打磨、批判或发展所谓坚实的理论；5.经常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限的多学科对话。见 Szanton 2002.

执行的自上而下模式，体现学科和专业分类的学习项目或者学位项目设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德国卡塞尔大学 2003 年一项研究表明，没有任何一种因素能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主导作用。²⁴这充分表明所谓的学科和专业目录在德国仅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这也是笔者与发布目录的德国联邦统计局通过邮件得到确认的信息。此外，在德国的联邦高校统计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分类法和专业目录，分别针对学生的教学以及主要针对科研人员的科研，称为“专业群（相当于我国的学科门类）、学习范围（相当于我国的一级学科）、学习专业（相当于我国的二级学科）”目录（下文简称“学习用目录”）与“专业群、教学与研究范围、专业领域”（下文简称“科研用目录”）目录。二者的区别在于，“学习用目录”较为宽泛，基本反映了传统学科概貌；“科研用目录”则更能反映某一学科的深入发展。以德国联邦统计局 2004 年发布的目录中“医学”专业群（或成为学科门类）为例，“学习用目录”中其下属“学习范围”（一级学科）2 个，再下属“学习专业”（二级学科）也是 2 个；而在“科研用目录”中，其下属“教学和研究领域”（一级学科）数目为 5 个，再下属“专业领域”（二级学科）为 71 个。²⁵这种分别对待“学习”与“科研”不同特点的专业目录，应该能够给我们充分的启发。

其次，对比德国历年学科和专业目录，我们从其历史发展中可以追寻知识学科化的轨迹：1993 年版以来的目录在很多学习范围/教学和研究领域之内增列了没有固定名称、以跨学科为特征的学习专业/专业领域。用中国的话语表达则为：德国从 1993 年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和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之下为跨学科性质的二级学科预留了发展空间。²⁶而在我国以《学科目录》为指导的高等教育体制下，作为新生事物、而且带有强烈的多学科和跨学科色彩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却不得不适应相对传统和固定的学科设置，委实有违知识发生学和学科化的内在逻辑。

第三，按照德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区域研究作为一级学科被归入“法学、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基本确定了以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为导向的学科定位。

²⁴ 胡春春等，德国高等学校学位制度及学科专业设置——传统、现状和启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8 卷（2007）第 1 期，pp.112-118. 尤见 p. 121. 更详细的叙述见同济大学调研组 2005 年向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提交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课题《“十·五”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研究》之德国子课题调研报告《德国高等学校学位制度及学科专业设置调研报告》（执笔人：胡春春），pp.24-25.

²⁵ 胡春春等 2007：119.

²⁶ Ibid., p. 120.